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讲学录

The Transcripts of
Leo Strauss' Courses

刘小枫◎主编



施特劳斯 (Leo Strauss)◎讲疏

哲人的自然与道德

——尼采《善恶的彼岸》讲疏

Leo Strauss' Course:

Nietzsche's *Beyond Good and Evil*, offered in 1971–1972

布里茨 (Mark Blitz)◎整理

曹聪◎译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讲学录

刘小枫 ● 主编



哲人的自然与道德

——尼采《善恶的彼岸》讲疏

Leo Strauss' Course:
Nietzsche's *Beyond Good and Evil*, offered in 1971–1972

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讲疏

布里茨 (Mark Blitz) ● 整理

曹聪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人的自然与道德: 尼采《善恶的彼岸》讲疏 / (美) 施特劳斯讲疏; 曹聪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经典与解释·施特劳斯讲学录)

ISBN 978-7-5675-5451-1

I. ①哲… II. ①施… ②曹… III. ①尼采, F.W. (1844-1900)—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7700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Leo Strauss' Course: Nietzsche's *Beyond Good and Evil*, offered in 1971-1972

By Leo Strauss, Mark Blitz ed.

Copyright © by Jenny Strauss and the Estate of Leo Strauss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enny Strauss and the Estate of Leo Strauss

ALL RIGHT RESERVED.

施特劳斯讲学录

哲人的自然与道德——尼采《善恶的彼岸》讲疏

讲疏者 (美) 施特劳斯

整理者 (美) 布里茨

译者 曹聪

责任编辑 陈哲泓 彭文曼

营销编辑 刘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h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插页 6

印张 20

字数 205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75-5451-1/B.1026

定价 70.00 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者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1949年,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施特劳斯执教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自1956年起至去世(1973),施特劳斯授课大多有录音。施特劳斯去世后,部分讲课录音记录稿一直在施特劳斯的学生们手中私下流传,并经学生之手进一步流传,其实际影响断难估量。本世纪初,部分记录稿的影印件也流传到我国年轻学子当中。这些打印的录音记录稿文字多有舛误,有些地方因油墨不均文字难辨,还有不少明显的脱漏。

2008年,施特劳斯遗产继承人和管理人——施特劳斯的养女珍妮教授(Professor Jenny Strauss)和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中心”(The Estate of Leo Strauss)主任塔科夫教授(Professor Nathan Tarcov)决定整理施特劳斯的全部讲课记录稿,并在“施特劳斯中心”的网站上陆续刊布,供天下学人分享。2013年,本工作坊计划将陆续刊布的整理成果译成中文,珍妮教授和塔科夫教授得知此计划后,全权委托本工作坊主持施特劳斯讲课记录整理稿的中译,并负责管理中译版权。

本工作坊按“施特劳斯中心”陆续刊布的整理本组织逐译(页码用方括号标出),进度取决于整理计划的进度。原整理稿均以课程名称为题,中文稿出版时,为了使用方便,我们拟了简要的书名,并在副标题位置标明课程名称。

刘小枫

2016年元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首席编者 塔科夫(Nathan Tarcov)

执行编者 麦基恩(Gayle McKeen)

李向利 译

施特劳斯不仅是著名思想家和作家,还是有着巨大影响的老师。在他的这些课程讲学录中,我们能看到施特劳斯对众多文本的疏解(其中很多文本他写作时很少或根本没提到过),以及对学生提问和异议的大段回应。在数量上,这些讲学录是施特劳斯已出版著作的两倍还多。对研究和修习施特劳斯著作的学者和学生而言,它们将极大地增添可供参阅的材料。

1950年代早期,由学生记录的施特劳斯课程笔记的油印打字稿,就已经在施特劳斯的学生们中间传阅。1954年冬,与施特劳斯的[关于]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的课程相关的首份录音资料,被转录成文字稿分发给学生们。斯多灵(Herbert J. Storing)教授从瑞尔姆基金会(Relm Foundation)找到资助,以支持录音和文字稿转录,从1956年冬施特劳斯开设的历史主义与现代相对主义(Historicism and Modern Relativism)课程开始,该资助成为固定的[资金]基础。自1958年起至1968年离开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在这里开设的39个课程中,被录音和转录成文字稿的有34个。从芝大退休后,1968年春季、1969年秋季和[接下来的]春季学期,施特劳斯在克莱蒙特男子学院(Claremont Men's College)授课,有录音(尽管他在那里的最后两次课的磁带已佚),他在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四年的课程也有录音,直至他于1973年10月去世。

现存原始录音的质量和完整性差别很大。施特劳斯[讲课]离开

麦克风时,声音会弱得听不到;麦克风有时也难以捕捉到学生们提问的声音,却常常录下门窗开关声、翻书声,街道上[过往]的车辆声。更换磁带时录音中断,[记录稿]就留下众多空白。施特劳斯讲课超过两个小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磁带就用完了。录音磁带转录成文字稿后,磁带有时被再次利用,导致声音记录非常不完整。时间久了,磁带[音质]还会受损。1990年代后期,首先是格里高利(Stephen Gregory)先生,然后是芝大的奥林中心(John M. Olin Center,由 John M. Olin Foundation 设立,负责调查民主制的理论与实践)管理人,发起重新录制工作,即对原始磁带数码化,由 Craig Harding of September Media 承制,以确保录音的保存,提高可听度,使之最终能够公布。重新录制工作由奥林中心提供资金支持,并先后由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和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负责监管。格里高利先生是芝大美国建国原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管理人,他在米勒中心(Jack Miller Center)的资助下继续推进这项规划,并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保存和访问处(Division of Preservation and Access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拨款帮助下,于2011年完成了这项规划,此时他是芝大施特劳斯中心(Leo Strauss Center)管理人。这些音频文件可从施特劳斯中心的网站上获得:<http://leostrausscenter.uchicago.edu/courses>。

施特劳斯允许进一步整理录音和转录成文字稿,不过,他没有审核这些讲学录,也没有参与这项规划。因此,施特劳斯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克罗波西最初把[讲学稿]版权置于自己名下。不过,在2008年,他把版权转为施特劳斯的遗产。从1958年起,每份讲学录都加了这样的题头说明(headnote):

这份转录的文字稿是对最初的口头材料的书面记录,大部分内容是在课堂上自发形成的,没有任何部分有意准备出版。只有感兴趣的少数人得到这份转录的文字稿,这意味着不要利用它,利用就与这份材料私下的、部分地非正式的来源相抵触。郑重恳请收到它的人,不要试图传播这份转录的文字稿。这份转录的文字

稿未经讲学人核实、审阅或过目。

2008年,施特劳斯[遗产]继承人——他的女儿珍妮(Jenny Strauss)——请塔科夫(Nathan Tarcov)接替克罗波西[承担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的工作。此时,塔科夫是芝大奥林中心以及后来的芝大美国建国原则研究中心的主任,而克罗波西直到去世,已经作为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忠诚服务了35年。珍妮和塔科夫一致认为,鉴于旧的、常常不准确且不完整的讲学录已经大范围流传,以及[人们]对施特劳斯思想和教诲的兴趣持续不减,公开[这些讲学录],对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来说,会是一种帮助。他们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鼓励:施特劳斯本人曾与班塔曼出版社(Bantam Books)签订过一份合同,准备出版这些讲学录中的四种,尽管最终一个都没出版。

成立于2008年的芝大施特劳斯中心发起了一项规划:以已经重新录制的录音材料为基础订正旧的文字记录稿;转录尚未转录成文字稿的录音材料;为了可读性,注释且编辑所有的记录稿,包括那些没有留存录音材料的[记录稿]。这项规划由施特劳斯中心主任塔科夫任主席,由克罗波西负责管理,得到来自维尼亚尔斯基家族基金会(Winiarski Family Foundation)、希夫林夫妇(Mr. Richard S. Shiffirin and Mrs. Barbara Z. Schiffrin)、埃尔哈特基金会(Earhart Foundation)和赫特格基金会(Hertog Foundation)拨款的支持,以及大量其他捐赠者的捐助。筹措资金期间,施特劳斯中心得到芝大社会科学部主任办公室(Office of the Dean of the Divis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职员伯廷赫布斯特(Nina Botting-Herbst)和麦卡斯克(Patrick McCusker)大力协助。基于重新录制的磁带[修订]的这些记录稿,远比原有的记录稿精确和完整——例如,新的霍布斯(Hobbes)讲学录,篇幅是旧记录稿的两倍。熟悉施特劳斯著作及其所教文本的资深学者们被委任为编者,基础工作则大多由作为编辑助理的学生们完成。

编辑这些讲学录的目标,在于尽可能保存施特劳斯的原话,同时使讲学录更易于阅读。施特劳斯身为老师的影响(及其魅力),有时会显露在其话语的非正式特点中。我们保留了在学术性文章(prose)中可

能不恰当的句子片段;拆分了一些冗长、含糊的句子;删除了一些重复的从句或词语。破坏语法或思路的从句,会被移到句子或段落的其他部分。极个别情况下,可能会重新排列某个段落中的一些句子。对于没有录音资料流传的记录稿,我们会努力订正可能的错误转录。所有这些类型的改动都会被注明。(不过,根据重新录制的录音资料对旧记录稿做的改动,没有注明。)我们在尾注中注明改动和删除的内容(不同的拼写、斜体字、标点符号、大写和分段),尾注号附在变动或删除内容前的词语或标点符号上。文本中的括号显示的是插入的内容。缺乏录音资料的记录稿中的省略号仍然保留,因为很难确定它们指示的是删除了施特劳斯说的某些话,还是他的声音减弱[听不清],抑或起破折号作用。录音资料中有听不见的话语时,我们在记录稿中加入省略号。[记录稿中]相关的管理细节,例如有关论文或研讨班的话题或上课的教室、时间等,一律删除且不加注,不过我们保留了[施特劳斯布置的]阅读任务。所有段落中的引文都得到补充,读者能够方便地结合[引述的所讲]文本[的内容]阅读讲学录。施特劳斯提及的人物、文本和事件,则通过脚注进行了确认。

读者应该谅解这些讲学录的口语特点。文中有很多随口说出的短语、口误、重复和可能的错误转录。无论这些讲学录多么具有启发性,我们都不能认为它们可以与施特劳斯本人为出版而写的那些著作等量齐观。

2014年8月

目 录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中译本说明(曹聪)/

哲人的自然与道德

——尼采《善恶的彼岸》讲疏

英文编者导言/25

第一讲/37

第二讲/60

第三讲/85

第四讲/107

第五讲/129

第六讲/152

第七讲/176

第八讲/199

第九讲/222

第十讲/237

第十一讲/262

第十二讲/272

第十三讲/293

第十四讲/294

中译本说明

对施特劳斯而言,尼采最重要的意义恐怕在于,尼采重提“苏格拉底问题”并将苏格拉底置于他全部思想的核心位置——虽然尼采是苏格拉底最尖锐的挑战者。朗佩特把施特劳斯在成熟作品谈论尼采时的“典型现象”总结为“在责难中留有余地”。^①施特劳斯自称在22到30岁之间,“尼采完全主宰我的思想”^②,但他公开谈论尼采的作品并不多,唯一一篇专门研究尼采的论文是《注意尼采〈善恶的彼岸〉的谋篇》(以下简称《谋篇》)。^③《谋篇》是施特劳斯晚年的作品,完成于1972年3月12日至1973年2月,由他本人收入生前最后一部文集《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研究》,这篇文章被精心编排在整个文集的中心位置。^④这篇论文主要讨论尼采的《善恶的彼岸》,篇幅不大,只有38段,处理起复杂的尼采问题却举重若轻。文章从《善恶的彼岸》的结构形式切入,揭示尼采思想最深刻的意图,同时将之纳入柏拉图路向的政治哲学脉络之中。这篇文章对我们理解施特劳斯与尼采的关系、施特劳斯对待古今之变的解释都非常重要。

① 《施特劳斯与尼采》,朗佩特著,田立年、贺志刚译,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2。

② 1935年6月27日致洛维特的信,中译见《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朱雁冰、何鸿藻译,华夏出版社,2006,页244。

③ 施特劳斯对尼采的态度很复杂。朗佩特专门著书研究这个问题,见《施特劳斯与尼采》,2005。

④ 关于《谋篇》在该文集集中的位置安排,可参考朗佩特的分析,见《施特劳斯与尼采》,前揭,页9。

不过,《谋篇》一文言简义丰,对于我们这些学养不够深厚的读者来说,读起来还是有些费力。单以《谋篇》首尾两个关键的核心句为例,这两句话都非常难解:开篇首句是“我一贯认为《善恶的彼岸》是尼采最美的(the most beautiful)作品”;全文收尾则是“高贵的自然取代神圣的自然”(die vornehme Natur ersetzt die göttliche Natur)。所幸的是,施特劳斯曾多次开设尼采研读课,在写作《谋篇》的前一年,他曾在圣约翰学院开设了两个学期的《善恶的彼岸》研读课(1971年10月到1972年5月),尤其幸运的是,这两学期的课程录音基本完整保留下来。可以说,这个录音是我们理解《谋篇》、乃至“施特劳斯与尼采”问题的重要资料。^①

施特劳斯对尼采“在责难中留有余地”,注重写作艺术的施特劳斯公开发表论文时,其姿态非常不同于与私下通信和课堂表现。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1959)中,施特劳斯明确指出,现代性的第三次浪潮和尼采有关,第三次浪潮的政治含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在《什么是政治哲学?》(1959)中,施特劳斯公开斥责尼采“没有丝毫的克制”,因为,就现实政治层面而言,尼采没有给身后的读者留下任何选择余地,最终导致人们对具体政治活动的两种极端态度: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极端激进。施特劳斯的公开写作不断提醒人们警惕尼采的教诲。但是,在私下的通信与讲课中,施特劳斯又毫不掩饰对尼采的激赏。当学生在课堂上问尼采是否是“种族主义者”这个政治敏感话题时,施特劳斯甚至毫不避讳地把“种族主义者”标签贴在自己身上,自称也是“种族主义者”——不过,他马上定义“种族主义者就是宣称世界上存在不同种族的人”,它“只是个标签而已”(第四讲),对于施特劳斯而言,尼采的“种族主义”只意味着承认种族之间的自然差异。早先的公开谴责与

^① 录音由不知名的编者先誊写出文字稿(160余页),后又经布里茨整理修改,补充脱漏的内容,并撰写编者说明,形成现有版本(扩充至220余页)。需要说明的是,读者见到的这个中译本第一稿依据旧版翻译,这一稿有大量错误、脱漏、误听、误植,难以阅读。所幸初译稿完成之际,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中心网站挂出这个新版本,译者遂依据新版逐句修改,本书依据新版标注页码。在译者依据新版的修改工作(几乎完全重译)完成之际,施特劳斯中心网站上挂出一个最新的英文版,这个最新版调整了版式,重拟了每节课的标题,因此页码也都有细微的改变,中译本已做相应改动。

后来的私下激赏并不矛盾,本次研读课为我们理解施特劳斯对尼采的态度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指引。

在第一讲开头,施特劳斯提出,首先要解决“为什么要读尼采”这个问题。他把尼采誉为“至少过去六代人(last six generations)中最深刻、最全面的提问者”,因为他重提“苏格拉底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往前数六代,大约是法国大革命。施特劳斯一开始就指出读尼采在政治与哲学层面的双重原因:表面原因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政治生活处境,深层原因是尼采在哲学上挑战苏格拉底,从施特劳斯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两个原因互相交织,关系非常复杂。尼采批判的现实政治生活处境,正是我们都不幸生活其中的处境,也就是尼采忧心预言的“现代观念”大行其道的时代:

在欧洲的所有国家,甚至在美国,都在滥用这个名字,那是一种很狭隘、受拘束、被拴在锁链上的精神,它所想要的差不多就和我们意图和本能中的内容恰恰相反,——更不要说,它对于那些正在兴起的新型哲人而言根本就是关死的窗、闷死的门了。丑话少说,他们属于平均主义者,这些被叫错了的、名不副实的“自由精神”——他们巧舌如簧,妙笔生花,却是民主品味及其“现代观念”的奴隶;统统都是没有孤独的人,没有自己的孤独,呆头呆脑的乖孩儿,倒并不欠缺勇气和令人起敬的好习惯,但他们不自由,十分浅薄可笑,尤其是还特别爱好在迄今的旧社会形式中寻找一切人类苦难和失败的大致原因;殊不知这样一来,真理就被幸运地倒了个儿!他们全力追求的,是绿草茵茵的牧场上的普遍幸福,那里每个人都能生活得稳定、安全、舒适、轻松;都被他们哼唱烂了的两套曲子或者学说是“权利平等”和“同情一切受苦者”,——苦难被他们当作了必须弃之如弊履的东西。(《善恶的彼岸》格言44)

尼采厌恶“平均主义”、“同情”、“弃绝苦难”等等浅薄低级的民主品味,而这是现代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现实处境,从尼采对现代观念的批判出发,施特劳斯首先从传统上对尼采思想的分期做出解释。第一个

时期,古典学与叔本华—瓦格纳“不稳固的结合”,这一结合激发出尼采对现代观念的强烈不满。他寄希望于以一种“艺术形而上学方式”解决现代问题,为现代精神奠基,于是,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以叔本华的方式提出一种悲观主义形而上学。第二个时期的尼采自称“地底劳作的鼯鼠”,也就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时期,在这里,他与一切“浪漫主义”(romanticism)决裂,并进入“精神危机”——尼采深刻地意识到,以浪漫主义新神学为现代精神奠定基础并不可能,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无法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得到解决。但是,否定掉形而上学之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与道德生活将失去基础与依托。于是,他的使命变成克服这场危机。尼采克服这场危机的方案表面看来非常极端——彻底推进现代科学及其启蒙精神。尼采后来称之为“一个老道的心理学家的地下工作”,也可以称为“关于形而上学与所有传统价值的‘化学’分析”,国家、社会、自由、真理,所有这些传统上被认为源于绝对本质化世界的东西,如今被尼采视为源于人的观念,在尼采看来,若要以科学的方式理解这些价值,就必须将之追溯至其生理起源。可是,问题在于,对人类所有重要观念的化学分析(亦即拆解)如何可能与人类对生存意义的必然追问相容。依据科学和启蒙的最终要求,人的生活被还原为机械的、彻底的生理现象,这种还原与宣告人类生活的虚无主义性质仅一步之遥。不过,尼采当然想到虚无主义不能作为整个人类生活的根基,只能作为一种个人性(personal)的洞见。尼采意识到,科学真理带给不同人的生活的冲击程度不同,而人需要一种“必要的非逻辑性”:

人即使再有理性,也不时需要自然的天性,即对万事万物的一种非逻辑的基本态度。(《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章,格言 31)

这样就迎来了第三阶段的工作——“伟大的光明与启发”,虽然《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5)被尼采称作“前厅”,并且写作于《善恶的彼岸》(1886)之前,但《善恶的彼岸》却是理解《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准备,尼采称《善恶的彼岸》为“从灵魂里涌出的一本骇人的书”。

《善恶的彼岸》副标题是“未来哲学的序曲”，根据尼采本人在《瞧，这个人》中自我剖白，这本书是他哲学肯定之书《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反面，它和《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不同的方式说着同样的事情，它的使命在于“对现代性的批判”。

讲到这里时，施特劳斯顺带补充了一句：“在我看来，《善恶的彼岸》是尼采最美的作品。”（第一讲）这句话并非无关紧要的闲话，因为他拿这句话作为《谋篇》的开篇首句，而这也许是施特劳斯尤其看重这本书的一个原因。

一、尼采“最美的作品”

在课堂上，在论文中，施特劳斯反复提到自己“一贯认为”《善恶的彼岸》是尼采最美的作品。他为什么总是特地强调这本书“最美”呢？施特劳斯唯一公开发表的关于尼采的论文《谋篇》以此书为讨论对象，是不是由于它“最美”呢？那么，这本书究竟美在何处？

施特劳斯推崇《善恶的彼岸》，他特地提到，尼采本人最推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认为《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思想上“最深刻”（the most profound）、“在语言上最完美”（most perfect in regard to language）。施特劳斯似乎在用他与尼采本人的不同判断提醒我们注意，他所谓的“最美”既非思想内涵之“深刻”、也非语言形式之“完美”。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究竟在施特劳斯看来，还有什么样的美比思想之深刻与语言之完美更值得关注呢？

《谋篇》首先给出一个非常柏拉图式的理由：施特劳斯在《谋篇》中举柏拉图为例，解释何谓“最美的作品”，他认为柏拉图最美的作品是《王制》、《斐德若》、《会饮》，但这三部作品未必是柏拉图最深刻的作品。施特劳斯没有解释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三部作品的美与深刻，在这个例证中，他没有提到“语言上最完美”，只提到思想上“最深刻”。但是，施特劳斯随后说，“然而，柏拉图没有在其作品当中就其或深刻、或美或语言上完美做出区分”。施特劳斯重新提到语言形式上的完美，重点在于，他断言柏拉图没有刻意区分思想深刻、美或语言完美，换

句话说,柏拉图那里思想深刻与形式完美与美是统一的,而尼采这里则是分开的。施特劳斯进一步解释说,柏拉图的关注点在自身之外,而尼采更关注个体性(personal)。^①例如,在《朝霞》前言中,尼宣称地下人完成地下的劳作后,重返人间将不再保持沉默,他将讲述“他自己”。而施特劳斯指出,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的关怀与其他作品不太相同,它没那么个体化。换言之,施特劳斯说它“美”也与它没那么个体化相关。那么,如何理解这个个体化?柏拉图式政治哲学有个核心问题,即“哲学与城邦”,哲人本身的沉思生活与洞见本身反而并非核心。而在尼采看来,哲人个体性的沉思才更优先。如前所述,第三阶段的尼采意识到关于“致命真理”的洞见只能属于哲人的个体性思考,可是,整个人类生活无法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哲人的使命不仅在于洞见“致命真理”,还需要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哪怕最终目的仍是维护哲学。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的使命不再是思考致命真理本身,而是要为哲学负责,开始思考人类的生活。

施特劳斯从《善恶的彼岸》的谋篇布局看到了尼采的这项使命。因此,施特劳斯公开发表的《谋篇》选择了这样的切入点,讨论尼采的意图。在文章的第六段,施特劳斯概括了尼采这本“最美的书”的结构。施特劳斯说,第四章“格言和插曲”将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哲学与宗教,第二部分论述道德和政治。施特劳斯强调,哲学是这本书的首要主题。同时,尼采不同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对他来说,首要主题是,哲学或宗教由谁来统治,而政治次于哲学或宗教。因为,尼采看到,哲学面临着新的危险,他认为,这种危险是柏拉图哲学的必然后裔——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它们撼动了哲学的确定性(certainty)。而尼采必须捍卫哲学。在施特劳斯看来,正是这本书的谋篇展现出,就捍卫哲学的利益而言,尼采与柏拉图的根本使命一致。因此,施特劳斯断言,在尼采亲手出版的惟一一本书中,尼采虽然在序

① 施特劳斯在这里提到比起柏拉图,尼采更关注个体性,关注“尼采先生”。必须留意,这个个体性限定在哲人尼采或哲人柏拉图上,“尼采先生”首先是位哲人,而非普通人。换言之,这里强调的实际上是对哲人/哲学而言更切己的东西。用朗佩特的话说,由于尼采,哲人的人性才是关注的中心,而非哲人之外的某个理念化的人、神圣的自然。

言中以柏拉图的对立面出现,但这本书在形式上却最“柏拉图化”。^①它最符合一个柏拉图式的目的。同时,施特劳斯对尼采谋篇布局的分析揭示出,尼采在哲学与宗教关系上的发现(前三章)促使哲人在道德和政治上承担起使命(后五章)——形式上的谋篇布局深刻地暗示着一种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的出场。

根据尼采在《善恶的彼岸》格言 202 对具有“现代思想的人类”种种生活现象的描述,现代症状在相信群体同情的道德中达到顶峰,尼采发现今日这种被称为“畜群道德”、“畜群本能”的较低层次的道德,广泛见于现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而这与民主运动密切相关。于是,在整个课程中,施特劳斯不止一次花时间解释尼采与保守派、自由派、种族主义等等敏感现实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施特劳斯坦言,喜欢尼采的人也无须对尼采与纳粹的亲缘关系讳莫如深,但是,对于理解尼采这样深刻的思想家来说,单就他在现实政治层面引发的影响来否定其思想就显然走偏了。然而,尼采的深刻决不仅仅在于洞察到民主道德品味的低劣而已。施特劳斯坚定地认为,尼采本人也会对希特勒代表的东西深恶痛绝,同时也认为尼采在言论和观点上的不节制的确与法西斯主义有关。在课堂讨论上,他评价:“尼采写下了这类命

① 施特劳斯在《谋篇》的第三段特地强调《善恶的彼岸》是“由尼采出版的唯一一本书”(the only book published by Nietzsche),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深谙柏拉图政治哲学传统和柏拉图写作笔法的施特劳斯非常在意作品的公开出版是否出于作者本人的意愿。在讨论“理念”问题的柏拉图对话《帕默尼德》中,私密的小圈子聚在一起最初讨论的是芝诺的哲学论文,柏拉图在那里特意让芝诺强调,这篇论文的流传并非出于芝诺本意,而是被人偷走。关于“一”的核心讨论开始之前,帕默尼德特地强调,由于是自己人,接下来的纯哲学讨论才有可能进行。也就是说,施特劳斯强调有些议题是尼采本不愿公开发表的,而尼采愿意公开发表的作品是一部“柏拉图化”的作品。反观施特劳斯《谋篇》发表于施特劳斯逝世之后,虽然在施特劳斯逝世前这篇文章已经完稿,并且在与学生(自己人、熟悉的圈子)的研讨课上讲授了文章中的几乎所有内容——甚至更多、更显白。被毁谤为“玩弄隐微术”上瘾的施特劳斯极有可能在最后的写作与授课中实践了一次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原因或许正是在于,他在讲授尼采,讲授尼采对哲学新使命的看法,而这其中包含了施特劳斯本人对待哲学根本问题的态度。从遗嘱执行人在最后一本施特劳斯身后出版的《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前言可以看出,施特劳斯在如何安排这篇《谋篇》的次序也在故意含混,使其显得出于偶然才处于现在的排序,这展现出施特劳斯对于如何安排尼采的身位的有意含混。